

价值观不同 民族感太强 中美两国难成哥们儿！ ——美国驻华使团副团长王晓岷博士纵论中美关系

本报记者 孙殿涛

三月八日下午,半杯清茶社在波多马克社区中心举办公开讲座,特邀王晓岷博士演讲中美关系。王晓岷博士是美国国务院资深外交官,自2011年1月起担任驻北京使团副团长,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的副手,2013年8月卸任,现任美国国务院主管亚太经合组织(APEC)事务的高级官员。在近三十年的外交生涯中,王晓岷博士长期履职亚洲,足迹遍及远东地区,并访问了除西藏、内蒙古之外中国所有的省份,曾参与涉及中国的重大决策,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和现状有着深刻的了解和认识。征得王先生和半杯清茶社同意,特将讲座主要内容整理如下,以飨读者。

价值观不同,两国难成哥们

我与中国的缘分始于1994年,曾先后在上海、北京、香港、台湾、新加坡等地工作,2001年到2005年在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做经济参赞,2011年到2013年任公使。2011年是洪博培大使请我去的北京,四个月后,他辞去大使工作回美国竞选总统。骆家辉大使2011年8月上任,没有炒我的鱿鱼,帮他做了两年多的使团副团长。我从事外交工作30年,大部分时间都在远东。即使在国务院工作,负责的也都是亚洲事务。

1979年5月我第一次跟着母亲去中国大陆探亲,那时候两国刚刚建交,此时距她1949年离开大陆已经过去了整整30年。那时候,中国人都骑着自行车,穿着也非常简单。从1979年到现在,中国在经济、社会等各个方面都有了巨大的变化,中美之间的变化也很大。那时候,两国的贸易额几乎为零,而现在已经达到5000亿美元。去年来美国读书的中国留学生是23万,加上旅游的人数有一百多万,而去中国旅行和做生意的美国人差不多也是这个数。从两国几乎没有往来,到每年有将近两百万人相互往来,这个变化是惊人的。从政治角度来说,两国元首的接触也非常频繁,双方交换意见的机会也很多,这对两国关系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

但是,两国之间的波动也不少,我自己也经历了很多。记得在2011年,美国再次向台湾提供军售,那时大使不在,我作为临时代办,凌晨三点被叫到中国外交部挨训。当时接见我的是时任外交部副部长,现在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先生和几位司长,其中包括现在驻美国大使馆公使陆慷先生。除此以外,还有西藏的问题,只要总统一见达赖喇嘛,我凌晨就会被叫去挨训。幸运的是,不久前奥巴马总统见达赖我已经离开了,接替我的那位老兄将代我受过。我这次在北京三年,最紧张的是陈光诚,以及钓鱼岛问题。中方认为,我们是站在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的背后进行挑衅,钓鱼岛有什么事,南海有什么事,我们都会被称为挨训。

我认为,三十年来,两国关系总的来说是积极的,但一直存在问题,有时甚至很危险。比如1989年,因“六四事件”两国险些断交,只所以最后没有断,是因为老布什总统的坚持。他认为两国绝对不能断交,应保持与中国的来往。现在看,这显然是一个正确的决策。

我经常问自己,两个国家为什么总是磕磕绊绊,时好时坏?我的答案就是,中美关系不可能没有波动,尽管我们有很多共同的利益,特别是在贸易上,但在价值观方面远远没有达成共识。我们与中国在个人自由、人权等问题的看法上

有很大的不同,所以无论是台湾,还是西藏问题,以及陈光诚、刘晓波等等,从我们的角度来说,出发点都是为了保护人的自由和权利,而中国认为是干涉内政。因此,出现了许多矛盾和分歧。

希拉里在这方面非常积极,无论发生任何问题,她都会公开、直接地表达自己的观点。而克里在这方面就显得比较婉转,做法也更加外交。1995年,希拉里参加在怀柔举行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,就讲出“妇女的权利就是人权!”,她讲话一直非常直,不绕弯子。我记得,2012年9月她途径北京参加APEC会议时,曾经直接问我,她这样直接了当地讲话应不应该?我说应该!我对她说,尽管美国也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,但在这里,个人自由、言论自由和人权被视为最重要的,假如没有这些,我们就不是美国。美国是一个开放的社会,有话就讲,有意见就说,它体现了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。在这方面,我们与中国政府有很大的不同,与其避重就轻,遮遮掩掩,不如直接了当,有话就说。

因此,我认为中美两国出现问题的最根本原因,就是价值观的不同。我们可以在许多方面进行合作,但如果在基本价值观上有分歧,就很难有信任。我们周围的很多人不喜欢中国,不是因为他们对美国缺乏了解,而是打心眼里就不信任你。比如说,如果你认为某个人不道德,经常说谎,你怎么能够跟他好起来。双方可以来往,可以做生意,但真的能够志同道合吗?真的能够做哥们儿吗?

站在中方的角度看问题,自150年前的鸦片战争、八国联军、八年抗战到现在,他们始终受到外国人的欺负,强烈的民族感使他们觉得,其他国家做的任何对中国不友善的行为都被认为是在欺负中国,而不会从价值观上找原因。正是这种意识上、看法上的强烈反差,才是造成两国关系波动反复的重要原因。依我看,两国关系十年、二十年不会有根本的改善,但从长远的角度,我还是比较乐观。我在中国工作十几年,与学生和NGO(非政府组织)有过很多接触。我发现他们的思想非常开放,有些想法甚至让你感到吃惊。比如有一年使馆举办“开放日”,我与很多年轻朋友谈到中国的腐败问题,贫富差距问题时,有位女学生站起来问,中国是不是需要革命?她的想法吓了我一跳,我对她说,要不要革命是你们自己的事情,我只想告

诉你,革命不是请客吃饭,需要付出代价,而且未必成功。

我还接触过一些记者,他们多数都是政府控制的媒体。我曾经问他们,面对这样那样的限制,该怎样工作呢?他们回答,你说得没错,我们的很多东西也许根本无法发表,但不能限制我们去写,不能控制我们的思想。他们的这些话,让我明白,他们的头脑都很清醒。我由此相信,总有一天,他们可以说他们想说的话,发表他们想发表的东西,因为他们一直在努力。也就是说,中国人民对于自由的渴望并没有因为各种限制而减少,相反在逐步增加。我相信,随着时间的推移,中美两国对于价值观的理解不可能完全一样,但会慢慢接近,从而使双方的共同点越来越多,分歧越来越少,波动越来越小。

民族感太强,或成消极因素

与美国人相比,中国人与生俱来强烈的民族观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。前不久我去上海,见到许多老朋友,大家在一起聊天,说起中国国内的问题,意见空前一致,但一说谈到钓鱼岛,看法就截然不同了。

从大学开始,父亲和我之间常有书信往来,这本书里(指《家书》)收录了父亲给我的十六、七封信,其中有一封信,谈到我要不要加入美国籍的问题。我1964年来美国不久就拿到了绿卡,直到1975年才加入美国籍。父亲在谈到这个问题时,说他曾经非常保守,数年前一位侄子准备从福建搬到广西,都被父亲指责为忘本。后来他自己不仅离开了福建,而且跑到美国,成为美国人。父亲说,我们在美国生活、工作,就应该对这个国家有一份责任,也要享受美国的权利。他认为,一个人只要能对社会有贡献,对别人有帮助就够了,不需要强调自己是中国人,还是美国人,是白种人,还是黄种人。我从小在菲律宾长大,朋友当中既有华人,也有菲律宾人。即使是住在马萨诸塞那个小镇,也从来没有想过这里只有我们一户中国人。

后来我在做公使的时候,在接受采访时经常被问到这样的问题,作为华人,你在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工作有什么看法。他们似乎过分在意我的肤色。我在诧异之余,会告诉他们,我从来没有注意过自己因为是与华人与大家有什么不同,而且从没有因为肤色影响我的工

作。但在之后的微博上你会发现,不断有人指责我是数祖忘典。

之所以谈这个问题,并不是因为民族感不好,而且觉得民族感应该是积极的,而不是消极的。不是排外的民族感,不是歧视别人的民族感。假如是积极的,它会成为一种力量,反之就会成为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障碍。

我是读历史和国际关系的,回头看看历史就会发现,不止是中国人有民族感,想想当年德国人对待犹太人,想想英国人、法国人对非洲人的做法,想想日本人对待中国人的做法,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,当一个国家的民族感过强,过分消极的时候,它带给人类社会的悲痛将是灾难性的。

最近在飞机上看了一部电影,叫《自由之路》,描写的是南非黑人领袖曼德拉的故事。几十年前的南非,白种人对黑种人的做法非常残酷,曼德拉作为其中受迫害最严重的一位,曾在监狱度过了27年。他出来后,很快就与他的第二个太太温妮·曼德拉分手了,原因之一就是温妮怀有强烈的民族感,报仇几乎成为她生命的全部。可曼德拉不这样看,他说,白人对我们不好是因为我们的皮肤是黑的,但我们决不能因为白人的皮肤是白的而对他们不好,否则就等于接受了他们的想法和做法,这也是曼德拉的伟大之处。

在王先生的演讲告一段落后,听众们纷纷提出各种问题与王先生讨论。

有听众问,如您所说,中美之间由于价值观的巨大差异使两国很难做哥们,那么,美国与台湾能不能做哥们,与日本能不能做哥们,与法国、德国能不能做哥们?

王先生说,说实话,我们与台湾、日本都是哥们,因为彼此的价值观非常接近。不要说政府,像马英九等人,他们曾在美国读书,有着与我们相同的价值观。我在台湾与上上下下的人交往,就像是家里人一样,没有任何隔阂。我们与台湾、日本、英国、法国之间也有分歧,也有矛盾,但价值观相同,因此彼此信任,成为不折不扣的哥们。

有听众问,作为一名华裔外交官,你在中国工作,是优势多一些,还是挑战多一些?

王先生说,说实话明两个都是。我时常接触学生和普通老百姓,我的肤色和语言使我具有一定的优势,交流比较顺利。但恰恰正因为如此,他们对我的期望值就会

很高,希望能够站在中国的角度考虑问题,可我做不到,常常被骂忘本,因此又是挑战。

有听众问,今年恰逢甲午年,一百多年前,日本通过武力在中国得到了许多利益,包括钓鱼岛的管理权。那么,对于眼下剑拔弩张的中日关系,美国应该持什么态度?

王先生说,对于钓鱼岛的主权问题,美国政府的立场是没有立场。我们希望可以找出和平解决的办法,为此,2012年我们曾派出资深外交官为双方劝架。除此之外,我就不晓得美国政府还能做什么。我们不可能要求中国或是日本应该怎么做,我们既没有这个权力,也没有这个力量。

有听众问,美国是个非常实际的国家,在处理许多重大问题时,除了价值观,更多地是考虑利益,是这样么?

王先生说,我个人认为,假如世界上只有利益就好了。我们做人都不是这个样子,我们有很多利益关系,但也有哥们关系和各方面的关系,为什么国家之间就不能有价值关系呢?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来就很简单,并非只有利益。我喜欢一个人,即使他对我没有利益,我也可以对他好。这是文明,不是利益。你看到外边一个人被抢,你去帮他,你们之间没有利益,只有文明和正义。举个例子,二战后,两大战败国——德国和日本迅速崛起,我们有没有反对,没有,我们还帮他崛起,为什么,我们不认为他会对美国构成威胁。但如果我们与另一个国家在价值观上分歧很大,你的崛起当然会令我担心。因此对于中国的崛起,我们不是遏制,而是担心。不光我们担心,东南亚也担心,原因是他的透明度,他做事的方式,他把自己的人民投入监狱的方式,对我们有威胁感。如果中国社会能够更加公开,能够给人民自由,给媒体自由,我相信,我们的威胁感就不会那么深,反应也就不会那么强烈了。

有听众问,对中国了解多是否被选中做中国大使的机率就高?

王先生说,能够提名一位了解出使国情况的大使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事。假如他对中国不够了解,但身边有了解情况的得力助手,也不会影响把正常的看法传达给华盛顿。骆家辉就不是一个中国问题的专家,但他愿意听取职业外交官的意见,从而弥补了他的不足。

有听众问,今年3月1日发生在昆明的恐怖暴力事件,致使29条无辜的生命被剥夺,但作为对价值观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美国却迟迟没有作出反应,而马航失联的下落尚未被确定,美国却早早表态,你怎么看这个问题?

王先生说,我以为,只要你杀了无辜的人就是恐怖分子,这是毫无疑问的,理应该受到严厉地谴责和批评。而美国政府对此反应迟缓,我认为这是由于两国政府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不同,尤其是对新疆、西藏问题的看法,缺乏对中国足够的信任,因此对中国提供的信息不会在一秒钟内作出大家期望的反应,需要做必要的核实、确认,而且格外小心。假如这事发生在英国,美国就会对一切深信不疑。

……

不知不觉,两个多小时过去了,听众仍然意犹未尽。大家一方面钦佩王先生诚恳、坦率的表述和睿智、精彩的回答,更惊异两个多小时的对话,王先生几乎是用中文完成的,尽管他一再表示自己中文很差。为此,我们不得不更加敬佩他作为职业外交官深厚的学养和文化底蕴。(根据录音整理,未经本人审阅,摄影:孙殿涛)